

站在十字路口的苏联战略

托馬斯·沃耳夫著

(供內部參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站在十字路口的苏联战略

托馬斯·沃耳夫著

北京編譯社譯

(供內部參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Thomas W. Wolfe
SOVIET STRATEGY AT
THE CROSSROA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4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4 年英文版译出

• 供内部参考 •

站在十字路口的苏联战略

[美] 托·沃耳夫著

北京编译社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五) 1.20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1/4 · 印张 9 1/4 · 字数 218,000

1965 年 7 月第一版 1965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812

目 录

誌 謝	1
导 論	2
第一章 核时代对苏联軍事政策的影响	16
第二章 苏联内部的軍事辯論	23
苏联公开討論的性质	23
辯論的主要輪廓	26
第三章 苏联在东西方战略討論中的声調	33
討論的性质	33
苏联内部問題在討論中的反映	37
向西方发出的“信息”	41
第四章 索科洛夫斯基著作新版的一般意义	44
第五章 苏联威懾态势的可信性	48
威懾和外交政策	48
对西方的一般警告	50
苏联的論点比以前客观和严谨的傾向	52
先发制人的問題	55
引起苏联目前忧虑的几个原因	58
第六章 战争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問題	60
經典理論变质的各种征象	60
苏联国内关于列宁的名言的辯論	61
苏联在战争与政策問題上展开辯論的意义	65
第七章 軍事优势的理論	68
苏联坚持奉行追求軍事优势的政策	69
量和质的优势的相对重要性	71

优势——是既成事实呢，还是政策目标？	74
軍事优势理論的缺陷	76
第八章 軍政关系紧张迹象	79
重申政治在軍事事務中居首要地位	80
軍事专业化对政治思想教育——老問題新波瀾	85
軍方影响政策的問題	87
为軍方的影响辯护的“后卫行动”	90
第九章 未来战争的性質及其可能性	96
苏联对于未来世界战争的設想	97
苏联对于战争可能性的看法	101
第十章 有限战争	103
关于有限战争和战争升級的理論的轉变迹象	104
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	109
第三国的冲突和升級的問題	111
第十一章 速决战与持久战之爭	113
关于战争時間长短問題的辯論	114
同速决战与持久战之爭直接相关的一个問題—— 社会在核战争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118
第十二章 关于軍隊規模的爭論	121
贊成“千百万人”的軍隊的論据	122
承认維持大量軍隊的經濟問題	127
軍方对 1963 年裁軍建議的反应	129
第十三章 战略部队和战略作战所占的首要地位	133
战略首要地位問題上的理論轉变	134
对战略作战的特点的看法	138
对限制战略打击目标的态度	141
在心理—政治上利用战略導彈部队	143
对当前強調導彈的做法的抗拒迹象	145
第十四章 演变中的传统軍种的作用	149

地面部队	149
空军部队	153
海军部队	158
第十五章 苏联的战略防御	163
关于反导弹防御前景的看法	164
进攻与防御的问题	166
民防	169
第十六章 外层空间的军事用途	172
苏联对美国在军事上利用外层空间的谴责	173
苏联对于外层空间军事意义的看法	176
第十七章 苏联战略中的联盟问题	181
华沙条约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发展	181
中苏军事关系	186
第十八章 探索一种取胜的战略	194
在选择战略方面持续进行的辩论	195
对战略理论缺点的认识	197
第十九章 苏联军事战略和裁军	199
军事战略和裁军政策之间的联系	200
苏联军方对裁军的态度	204
第二十章 对手的形象	209
苏联对西方军事态势的力量和弱点的看法	210
对美国的针对武力战略的批评	214
战略讨论的未来前景	220
结论：站在十字路口的苏联战略	223
注释	227

誌 謝

本书是作者长期注意苏联的軍事事務、特別是軍事力量作为苏联政策工具的作用的一个副产品。然而，同大多数其他著作一样，沒有許多同事和朋友的鼓励和建議，它是难以写成的。那些曾經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慷慨提供过建議和花費过時間的人，很少会完全同意作者所說的一切；可以肯定，某些人在一些具体論点上会有很不同的看法。作者應該为他們不同程度的帮助表示感謝的人有：伯納德·布罗迪、罗伯特·D·克伦、赫伯特·S·迪納斯坦、雷蒙德·L·加特霍夫、馬修·P·加拉赫、約瑟夫·M·戈耳德森、累昂·古雷、楊·C·C·格拉姆、欧文·哈耳彭、唐納德·哈里斯、罗伯特·A·基耳馬克斯、詹恩·穆迪、菲利普·E·莫斯利、梅耳文·J·尼尔逊、約翰·S·派頓、索尔·波兰斯基、托馬斯·C·謝林、埃伦·R·西克特、里尔穆特、威廉·S·斯图尔特和威廉·W·泰勒。特別需要感謝的是那些受累最多、一直帮助我把原稿完全写成的人：我的研究助手安尼塔·馬格努斯以及貝特·洛格斯登、罗薩利·福諾罗夫和邦尼·利布。

本书是兰德公司为美国空軍进行的一項連續性研究計劃的一部分，其部分內容曾經以略有改变的形式发表在《外交季刊》、《共产主义問題》和《欧洲文献資料》等杂志上，这些刊物同意我利用这部分材料，对此也謹表謝意。

托馬斯·W·沃尔夫

1964年6月4日于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

導 論

在評論苏联事务的大量西方著作中，近年来日益認識到，苏維埃制度內部正在經歷一个变化的过程。随着苏維埃制度从斯大林主义时代进入赫魯曉夫领导下的时代，在政治、外交、經濟、教育、文化、科学和軍事方面（我們只提几个有关的領域），都出現了按照新情况进行調整和发生变化的迹象。可以肯定，西方研究苏联情况的人对这个变化过程或其动向的性质在看法上絕不是一致的。在某些基本問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見解。

譬如說，有一种看法认为，苏联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在許多基本方面同西方現代社会相似的社会（西方現代社会是由那些伴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而产生的事物所造成的）。同这种殊途同归論相反的另一種看法則认为，苏維埃制度正在以它自己的特殊方式发展着，其方向看来不会使它变成一个在政治和社会經濟方面同西方世界打成一片的社会。

在第二个突出的問題上，某些观察家感到，变化的进程已經使苏联对西方的敌視态度和目標有了很大的改变。另一些人认为，並沒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苏維埃制度和它的对手之間的冲突的基本原因已經大大减少。还有一些人則声称他們认为，苏联和西方的关系正处于从冲突与竞争的一个极端到日益展开合作的另一个极端的过渡阶段。

在第三个重要問題上，有人认为，苏維埃制度內部的变化进程受到了西方的政策和力量的巨大影响，苏联的未来发展动向将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一种相反的看法则认为，苏联内部的变化和演进主要是由西方难于控制或影响的力量造成的。

我们不能指望，在今后研究苏联事务时，这类问题会比过去容易解决一些。可是，单是认识到苏联的观点是易于变化的而不是像以往被普遍认为的那样一成不变和顽固不化的这一事实，似乎就是向更充分地了解和洞察苏联情况前进了一步。就此而论，值得指出的是，苏联军事事务和战略思想的研究者较早提醒人们，认为苏联脑筋顽固不化的旧看法已经不再是恰当的了。

这或许可以用以下的事实来解释：斯大林以后的时代开始之日，正是核时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开始在苏联发生强烈影响之时。因此，军事政策和战略的领域成为苏联思想界要求摆脱斯大林时代僵硬概念和严格服从的第一批领域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甚至在“非斯大林主义化”运动继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苏联生活的许多领域中带来修正和革新之前，苏联的某些军界人士已经开始对“斯大林主义”军事理论的神圣性和永久性表示怀疑。就赫鲁晓夫本人来说，他扮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创造性的发展者”的最初尝试就是以核时代的战略问题为对象的，当时他在苏共二十大上修改了列宁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总之，不管斯大林死后俄国发生波动和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看来可以正确地說，苏联领导的观点中最重要的新因素之一，就是愈来愈意识到核时代武器系统的涵义。军事领域内的革命肯定是形成斯大林死后十年中苏联政策所处的一般政治气氛和战略气氛的主要因素。

我在本书中主要研究的是1962年10月古巴危机以后这段时期内苏联军事政策和战略领域中的发展。在这段时期内，苏联领导一直谋求和美国达成某种形式的有限和解。我们无法预测这种

和解政策會延續多久。在某種程度上，和解時期的長短無疑將受到這樣一點的制約，即蘇聯領導在應付古巴危機促使他們嚴重注意到的各種戰略和軍事政策問題方面能取得多大成功。這不等於說蘇聯對創造和解氣氛的關心必然只是同蘇聯軍事態勢方面的缺陷有聯繫。在這方面起作用的還有其他許多因素。執行和解政策既不一定意味着赫魯曉夫的領導地位一般說來是不巩固的，以至不得不需要一段喘息時間便於他在國內外加強陣地。反過來也可以說，要能談判走向和解的步驟、從危機中脫身出來並且經得起挫折——特別是在共產主義陣營內部與之競爭的北京領導人的批評之下做出這一切，是需要特別牢固地掌握着領導杠杆的。

可是，雖然人們承認和解政策不一定能夠完全被說成是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和機會受到限制的產物，一般却趨向於認為，這些因素在促使莫斯科過去兩年奉行這種政策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事實上，本書的中心議題就是：蘇聯領導一直在爭取時間和謀求行動自由來應付越積越多的問題，而戰略和國防政策問題就是其中最棘手的一部分。本書的目的是要結合現代世界新的技術和政治環境帶來大批問題的背景，分析一下蘇聯有關上述問題的看法和爭論。這篇導論的以下部分就將一般地概述一下正文部分更詳細地探討的問題。

蘇聯領導面臨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關資源分配的問題。增加投資以維持工業的高增長率和支撐停滯不前的農業部門的需要，不斷增長的消費要求、在人力缺乏的局面下日益增大的勞動力需求、維持空間競賽的費用——這些是對蘇聯經濟提出的相互競爭的要求的一部分，它們使蘇聯領導人比過去兩年更難決定應該為軍事任務分配多少資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經濟困難可能是蘇聯力求造成一種東西方關係緩和的氣氛的原因。與此同時，蘇聯

領導又斷然聲稱，為糾正偏差而採取的經濟措施不得損害蘇聯的防務。

另一個由現代軍事工藝革命引起的基本問題，以蘇聯意識到核戰爭的毀滅性為核心。核環境不僅使戰爭顯得極端危險；它還有助於破壞關於戰爭和政治的聯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理論，引起了關於在導彈核時代使用或威脅使用軍事力量有多少政治價值的頭痛問題。

中蘇的繼續分裂是另一個很大的問題。它的影響是廣泛的。它加強了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離心力，加劇了莫斯科和北京爭奪對“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的鬥爭，除此以外，它還可能使蘇聯據以制訂計劃的某些基本戰略假定遭到懷疑。莫斯科和北京之間愈來愈大的分歧，加上東歐各國要求更大自治權的騷動，已經迫使蘇聯領導不得不对共產主義陣營內部各國之間的軍事關係給予更大的注意。

與此同時，蘇聯在古巴設置導彈的行動以流產告終的兩年後，發展一種能夠在同美國展開實力競爭時符合蘇聯需要的軍事態勢，顯然提出了若干麻煩而仍未解決的問題。蘇聯內部的軍事辯論以及對外和美國進行的戰略對話都證明，在許多已經討論過一段時間的問題上，蘇聯仍然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思想流派。

過去幾年中在蘇聯進行的軍事辯論使人們對縈繞在蘇聯領導心頭的那些軍事政策問題有了深入的了解。也可以說，發表不同看法的自由現在比過去稍為大了一些。這種自由的幅度是波動不定的，為了維持共產黨團結的神話，仍然存在着一套要求婉轉地批評高級人士的繁文縟節。不過，蘇聯今天進行討論的環境確實比過去較多地容許公開表達分歧意見。

至於軍事辯論本身，其主流從五十年代後期起就一直是相當明確的，當時，赫魯曉夫政治統治地位的鞏固恰好逢上了這樣一種

前景，即苏联很可能不久就拥有相当数目的先进武器。从那时以来，辯論主要圍繞着的一直是政治領導者（特別包括赫魯曉夫本人）的一种努力：改变苏联原来的軍事理論和部队，使之走上被认为更能适应导弹核时代需要的方向。这种努力遇到了軍界某些方面不同程度的抵抗，而一部分与之有这种或那种利害关系的党政官員大概在暗中支持他們的抵抗。

不过，如果认为这只是軍政領導集团之間不同系統的意見之爭，那就未免把情况过于簡單化了。所爭論的問題的性质同單純由于組織系統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一样决定着辯論的面貌。事实上，軍界內部也存在着一股連續不断的辯論的支流，处于对立的两极的是“現代派”和“傳統派”观点，站在中間的則是一个持“中派”意見的集团。

現代派或多或少傾向于拥护赫魯曉夫所鼓吹的那些見解，主張更急進地把現代工艺运用于軍事方面。他們认为，这种做法也許能使他們得以削減武装部队的規模——可以說是以质量代替数量。另一方面，傳統派虽然承认工艺对軍事的影响，却仍然傾向于反对仅仅为了采用某种新的事物就輕率抛弃那些經過考驗的概念。

不論是現代派还是傳統派的观点，都不能說是統治了今天的苏联“官方”軍事理論，虽然过去几年的主要趋势看来是，現代派的看法日益变成赫魯曉夫和政治領導集团最欣賞的观点。同时有迹象表明，一种相反的趋势可能也正在出現，这是軍界某些方面对新“正統”的反抗，这种新“正統”体现了赫魯曉夫把导弹核武器置于絕對首要地位那类战略思想。現代派和傳統派的地位未定这一事实，如果不說明別的問題，也至少可以证明苏联的軍事辯論正方兴未艾。

苏联的軍事政策辯論中沒有解決的問題包括以下各点：

1. 平时應該維持的武装部队的規模以及在核条件下战时动员补充兵力的前景：赫魯曉夫在1963年12月提出了进一步削減兵力的建議（其目的或許是為了完成他早先在1960年提出、后来在1961年中止的削減兵力計劃），苏联的高級軍官对此显然缺乏热情。事实上，苏联地面部队司令崔可夫元帅就以很少掩飾的方式領头发动了一个反对这项建議的运动。他在1963年12月指出，西方各大国已經認識到“片面的”軍事理論的有害影响，因此它們在加强战略核力量的同时，也在加强自己的地面部队。虽然看来暗中反对削減兵力的运动已經失敗，赫魯曉夫似乎也作了某些让步：他公开保证兵力的削減將做到“合理”。

2. 苏联的部队應該准备打什么样的战争——速决战还是持久战：這個問題牽涉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一般被认为属于現代派，它主要強調核战争初期的**决定性**，以及有必要使苏联的武装部队和經濟作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內以尽可能小的損失”結束战争的准备。第二种观点比較注意持久战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在經濟、軍事和心理上为这种战争作出艰巨准备的需要。

3. 是否可以打有限战争而不致产生升級为核大战的危險的問題：苏联一方面声称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另一方面又在理論上认为，如果核大国被卷入的話，小規模战争就有逐步升級的巨大危險。在这二者之間仍然存在着矛盾。某些迹象表明（特别是在同美国进行的战略對話中），苏联对局部战争升級的可能性所持的看法已有改变。

4. 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远隔重洋的对手被卷入的任何未来的大战中，战略核作战和联合兵种战場作战各占多大比重：虽然战略导弹部队至高无上这一观点現在已經成为苏联軍事理論的定則，关于欧亚大陆上的战場战役應該在規模、性质和时机等方面怎

样同全球性战略作战相配合的問題，仍然存在着很多爭論。像武装部队的規模和战争时间的长短这类問題同上述問題也是交織在一起的。

5. 在核突然袭击的情况下幸存的希望：這個問題連帶着其他許多問題，最終包括从有意义的角度来看是否能够打贏（或打輸）一場核战争的問題。在軍事辯論直接涉及的範圍內，有一派认为敌方在核战争开始时掌握了战略主动就会使己方遭到不可弥补的損失和战敗。这种看法导致极端強調現成部队的高度战备状态，并且导致隱蔽地鼓吹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而这种战略同苏联声称决不会先动手的政治宣传是矛盾的。另一派軍事思想承认在战争初期迅速发动战略进攻的重要性，但认为战争在最初的核交鋒以后很有可能曠日持久。一部分持这种看法的人鼓吹为持久战作准备，他們认为，在这种战争中，苏方优越的政治和精神素质，加上殘存的经济和軍事能力，能够保证获得胜利。

6. 发展苏联武装部队的标准應該是主要強調威懾和恐吓作用还是实战价值的問題：軍队內部势力很大的一个集团显然感到，严格符合赫魯曉夫战略思想的那种軍事态势，在威懾万一失效时会使苏联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个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多半反映了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不同估計。虽然軍政两方的发言人一般都习惯于指責西方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預防性”战争，赫魯曉夫过去几年中私下的看法似乎却是：除非受到极端的挑畔，西方有意識地进攻苏联的危險是很小的。

7. 寻求一种在可能发生的以美国为对手的未来战争中取胜的軍事战略的問題：苏联軍事理論家看来已經日益意識到，面对美国这样一个远隔重洋的强大对手，传统的理論和作战部队有許多不足之处。可是，关于是否可以指望通过对美国本土迅速发动核打击瓦解美国的抵抗意志，还是有必要各个击破美国的武装部队和

占領美国以取得胜利的問題，仍然很难肯定。这种不肯定性又和另一个問題，即核战争是否已經不再能被看成是合理的政策工具問題結合在一起。一般說来，苏联的理論家和意識形态学家在公开場合仍旧拒絕接受現代战争“沒有胜利者”的看法，但是在許多苏联领导人內心中似乎已經非常怀疑，在苏联經受了一次核战争的破坏以后，实际上是否还能够得到什么可以有意义地称之为胜利的东西。

除去直接属于軍事政策和战略領域的这些沒有解决的問題以外，还不断有迹象表明苏联的軍政关系暗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透露出这种紧张关系的征候是：1962年秋季以来，又重新強調政治絕對領導軍事的原则。这里牵涉到各种問題，其中有一些問題是长期存在的。这些問題之一涉及軍隊在制訂防务政策和战略中的适当地位。党的主张傾向于认为，軍事領導只应当注意使苏联武装部队作好完成指定任务的准备的专业問題。而另一方面，在軍界人士中則有这样一种傾向，即认为現代战争的复杂性意味着，在使整个国家为可能发生的战争作好准备方面，軍方应当發揮更大的作用。这种观点意味着要求在决定基本国策方面發揮更大的影响。

虽然軍隊內部的辯論表明，关于許多問題的理論仍然处在变动之中，但是記住这样一点是重要的：基本問題上的一致看法依旧把苏联領導的各个部分团結在一起，就目标和政策而論，看法一致的領域无疑要比意見分歧的領域广闊。在許多軍事問題上，最近几年苏联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一致的。譬如說，以下各个問題就是如此：战略核武器在現代战备中的首要地位、战争初期的关键性意义、保持高度战备状态的必要、采納一种強調既摧毁軍事目标又摧毁民用目标的目标理論、拒絕接受限制打击目标和有控制的

反应的理論、承认在和平时期維持龐大常备部队的經濟困难等等。

在另外一些問題上，从近年来的苏联軍事討論中可以看出它們已受到更大的重視。我們只举几个例子：現在比过去更注意有限战争，更相信早发警报系統减少突然襲击成功机会的能力，更重視战略武器的硬化和机动性以及这类措施对于加强苏联威懾态势的可信性的作用，提高了导弹潛艇的战略作用的地位，稍为降低了远程轰炸机将来可能具有的作用的地位，但是提高了轰炸机打击海上目标的作用的地位，更重視反潛艇作战和两栖登陸的能力，更強調发展反导弹和反卫星防御系統的重要性等等。此外，苏联也愈来愈关心外层空間的潜在軍事用途，其核心論点是美国企图在軍事上利用外层空間使苏联不得不为自卫采取相应的步驟。

結合他們对外同西方主要是美国进行的战略對話来看，苏联軍政領導人对战争和战略問題的看法是很有意义的。作为对立双方交換意見的一种形式，大部分战略對話所关心的一直是（而且今后也多半仍会是）增进两大核强国多少是狹义的政策利益，每一方都利用公开的言論来加强自己的威懾态势，以自己的軍事实力謀取政治利益或是防止对手这样做，以及使盟国和旁观者对它的权威地位产生深刻印象。

但是，双方又都傾向于（这是可以觉察到的，尽管程度不同）认为，比較精确的战略交談是在导弹核时代借以澄清双方战略关系中的复杂現象和减少危險的手段。

在过去一年左右，苏方給战略討論增添了好几項內容，这些內容从对外和内部进行的战略對話的角度来看都是很有意义的。其中之一是 1963 年秋出版的索科洛夫斯基主編的《軍事战略》一书的增訂版，这个新版本距离被大吹大擂的第一版的問世还不到十五个月。另一項內容是苏联在《紅星报》上直接反駁了美国对索科

洛夫斯基著作第一版的評論。苏联軍政人士在表达这些以及其他某些战略思想时，往往有一种愈来愈精細地說明其論点的傾向，这样做的目的部分是为了对付或更正西方对苏联軍事态势和政策的解释。某些苏联著作就包含着关于局部冲突的升級、苏联的还击能力、先发制人、軍事和政治的关系等問題的“更正通知”。

苏联領導近年来的困难也在他們同西方进行的战略對話上打下了烙印，这种對話反映出苏联显然意識到有必要調整苏联的政策，使之适应战略形势在性质上的变化。

譬如說，他們一貫致力于提高苏联战略威懾在西方心目中的可信性。他們現在以比过去在技术上更到家的方式論证这一主题，同时他們一直企图让美国相信它不可能指望对苏联发动成功的先敌突击，也休想从它和苏联相比的战略地位中撈到什么政治利益。他們愈来愈強調战略火箭軍是苏联軍事实力的主要成份和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苏联发言人一方面断言苏联的导弹在质量上占优势，并且暗示只有苏联拥有“五千万吨級至一亿吨級或威力更大的”武器，另一方面仍然避免对苏美两方的远程导弹力量作数量的对比。

苏联对战略一級的战争进行的討論的另一个特点是，一直拒絕接受万一发生大战时有控制地使用战略武器或限制破坏的思想。从国防部长麦克納馬拉 1962 年 6 月在安阿伯发表演說以来（在那篇演說中，麦克納馬拉概說了一种战略理論，強調发生核战争时攻击对象應該是軍事目标而不是城市和人口），苏联評論家一直大肆攻击美国妄想为“針对武力”或“不打城市”的战略博得輿論支持。同时又有一些迹象表明苏联对下述指責是敏感的：苏联的战略概念是僵硬的，不如西方主张采取限制破坏的措施的立場那样人道等等。

同苏联对战略性战争的僵硬看法相对照的是，苏联也有一种